

林紓的海軍情結

——從《不如歸》說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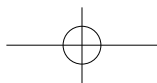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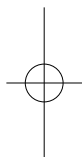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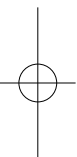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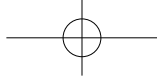
夏 曉 虹^{*}

摘 要

1908年，林紓與魏易合作，從英譯本譯出日本明治時期的暢銷書《不如歸》。與日人眼中的「家庭小說」和出版方商務印書館的標記「哀情小說」不同，林紓看重的是此書關於中日甲午海戰的敘述。故譯序中，林紓主要訴說由小說引發的「冤抑之情」。他不只希望借助日人名作，證明此戰中北洋海軍非如世人所指斥的「遁逃」，而是將士用命；並進而有意利用其古文家之筆，為海軍申辯、鑄史，留下了三篇紀實文章。追溯林紓為何如此關切海軍，實與福建船政局及船政學堂本是「中國近代海軍的搖籃」，清末海軍將士多半出身閩籍有關。林紓乃是將傳統的鄉土之情與現代國家思想融合，投射在海軍身上，由此表現為同海軍的榮辱與共。

關鍵詞：林紓、《不如歸》、海軍、冤情、閩人

*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榮退教授。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East Asia, Vol. 12

Jun. 2017, pp. 45-78

DOI: 10.29425/JHIEA.201706_12.0002

Lin Shu's Navy Complex:

A Discourse on Lin's Translation of *Nami-Ko*

Xiaohong Xia*

Abstract

In 1908, Lin Shu (林紓),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terpreter Wei Yi (魏易), translated *Hototogisu* (*Nami-Ko*), a bestseller in Meiji Japan, from its English rendition into Chinese under the title of *Bu Ru Gui* 《不如歸》. Instead of following the Japanese view regarding this novel as a “family story” or complying with the label of “melancholy novel” (哀情小說) branded by the publisher, the Commercial Press, Lin Shu put his emphasis on the narration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in the book. Thus, he devoted the main part of his preface to relating “the feeling of injustice” (冤抑之情) aroused by the novel. Not only did he mean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renowned Japanese work to disprove the “coward abandonment” (遁逃), of which people generally accused the loyal and devoting Northern Navy, but he also brought into full play his classical writing skills to defend and historicize the Navy with three pieces of non-fiction works. The reason why Lin Shu was so deeply concerned with the Navy could be traced up to the fact that the Fujian Shipbuilding Bureau and the Institute were “the cradle of Chinese modern navy” as well as the fact that more than half the Navy officers were born

* Emerita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Fujianese” (閩人) . Having fused his traditional local affection and the idea of modern state, Lin Shu projected his complex onto the Navy and ended up sharing the same breath with it.

Keywords: Lin Shu, *Hototogisu (Nami-Ko)*, Chinese Navy, the feeling of injustice, Fujianese

林紓的海軍情結

——從《不如歸》說起

晚清儘管出現了「寫情小說」這一類型，但對「情」的言說其實相當紛雜。引吳趸人（1866-1910）標為「寫情小說」的《恨海》中的解說為例（吳還有「苦情小說」《劫餘灰》、「奇情小說」《情變》等）：「人之有情，係與生俱來」，這種情「對於君國施展起來便是忠，對於父母施展起來便是孝，對於子女施展起來便是慈，對於朋友施展起來便是義。可見忠孝大節，無不是從『情』字生出來的。」而一般人所理解的「情」即「兒女私情」，吳趸人認為那「只可叫做癡」，或逕可稱為「魔」。¹在《劫餘灰》第一回中，他也講了大致相同的意見，甚至說：「大而至於古聖人民胞物與己饑已溺之心，小至於一事一物之嗜好，無非在一個『情』字範圍之內。」²以這樣廣闊的對於「情」的理解，林紓（1852-1924）也正該稱為「有情人」或者「至情人」。

一、《不如歸》引發的「冤抑之情」

1908年10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林紓與魏易（1880-1930）合譯的小說《不如歸》，作者為日本著名小說家德富蘆花（1868-1927，本名德富健次郎）。原作1898年11月29日至次年5月24日，在蘆花之兄德富蘇

¹ 吳趸人著，王俊年校點：《恨海》（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2。標點略有調整。

² 我佛山人：《劫餘灰》第一回，《月月小說》第10號，1907年11月，頁40。

峰（1863-1957）主持的報紙《國民新聞》上連載；經過修訂，1900年1月由民友社刊發了單行本，此後不斷再版，成為明治時期著名的暢銷書。1909年1月，《申報》的《不如歸》廣告稱其「已疊版七十餘次」。³實際上，1909年該書出版十年，已印行了100版；至1927年9月作者去世，總共印行了190版，發行50萬冊。⁴其間，1904年，小說由鹽谷榮（1873-?）與Edwin Francis Edgett（1867-1946）合作譯成英文*NAMI-KO*（小說中女主角浪子的日語讀音），林紓與魏易即主要依據此本譯出。⁵此外，《不如歸》還出版過德、法、波蘭、俄、捷克、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朝鮮等文字的譯本，⁶並且，魯迅留學日本期間，也曾經一度動過翻譯的念頭，⁷足見其感染力之強。而在林譯之前，1906年，已經有一位署名「惜月軒」的譯者譯過此書，目前可見同年10月在東京印刷、北京發行的漢譯《不如歸》上卷。

《不如歸》最大的特色是寫實，此即英譯本在封面使用了“A REALISTIC NOVEL”（「一部現實主義小說」）的原因。小說乃是根據陸軍元帥大山巖（1842-1916）的長女信子的婚姻悲劇寫成。信子1893年（明治26年）嫁給了警視總監三島通庸的長男三島彌太郎。婚後兩個月，信子患肺結核，次年離婚，不久死去。這個本事經過德富蘆花的加工，變成了一個淒婉的愛情故事。其間，無論是情節設置還是人物身分，小說都

³ 商務印書館：〈新年消閒之樂事（哀情小說）《不如歸》〉，《申報》第2張第8版，1909年1月28日。

⁴ 郭勇：〈「暢銷書」的策略：透視《不如歸》的帝國主義話語〉，收於徐曙主編：《日語教育與日本學》第2輯（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93。

⁵ 相關翻譯情況可參看鄒波：〈林紓轉譯日本近代小說《不如歸》之底本考證〉，《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2009年秋季號（2010年3月），頁123-129。

⁶ 參見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年），頁226；潘少瑜：〈國恥癡情兩淒絕：林譯小說《不如歸》的國難論述與情感想像〉，《編譯論叢》第5卷第1期（2012年3月），頁99；楊文瑜：《文本的旅行——日本近代小說〈不如歸〉在中國》（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4。

⁷ 參見周作人談，梁縱武譯〈閒話日本文學〉：「魯迅住在東京的時候，曾一度想從日本語直譯出來，可是終於如原樣的未動手。」收於《國聞周報》第11卷第38期（1934年9月24日），頁2。

有所改動。離婚過程中，男主角的態度本來也起了作用，但在小說中變成了受制於其母，在男方不知情的情況下，造成了離婚事實。為此，《不如歸》中的男主角川島武男被設定為海軍軍官，以便他能夠不斷離家外出（而三島彌太郎本人的履歷是出任過農商務省、遞信省囑託，橫濱正金銀行董事長，日本銀行總裁等職），⁸ 其與夫人片岡浪子之間的家庭悲劇，也被放置在離婚當年發生的日清戰爭的背景中展開。

可以想像，《不如歸》之所以受到各國讀者的歡迎，應當是因為它能夠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得到滿足。這部小說在明治時期的日本，「是作為一種家庭小說而受到讀者的歡迎的」。⁹ 小說中最動人的情節，正是男女主人公優雅、浪漫的純真愛情，以及專制家長強迫拆散一對熱戀中的夫妻，導致病中的女主角淒涼離世。而轉換到中國語境，如惜月軒在〈序〉中強調的是，《不如歸》「既可以陶淑性情，又可以發達智識」；前者指的是作品的情感淨化作用，後者則關係到晚清對小說的格外看重，故譯者認為：以小說輔助「各種科學」，「方可以達學問之極點」。¹⁰ 實則，此一對《不如歸》有益德育與智育的期待，終不如商務印書館將其定位為「哀情小說」更能打動人心。廣告中著力推贊的「摹寫情節，哀豔動人」，¹¹ 確是吸引眾多中國讀者的核心要素。

在此背景下，閱讀林紓為《不如歸》撰寫的譯序，很容易發現其說不但和日本明治社會有距離，甚至與惜月軒、商務印書館也大不同。當然，在序言開篇，林紓也會肯定：「小說之足以動人者，無若男女之情。」並以《不如歸》為其所「譯書近六十種」中最悲情的三部作品之一，即「最悲者」《黑奴籲天錄》，「又次則《茶花女》，又次則是書矣」，¹² 從而

⁸ 詳參郭勇：〈「暢銷書」的策略：透視《不如歸》的帝國主義話語〉，收於徐曙主編：《日語教育與日本學》第2輯，頁96-97。

⁹ 吉田精一著，齊幹譯：《現代日本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頁36。

¹⁰ 惜月軒：〈序〉，蘆花生著，惜月軒譯編：《（漢譯小說）不如歸》（東京：共成舍，1906年），序頁1-2。感謝樽本照雄先生提供了相關資料。

¹¹ 商務印書館：〈新年消閒之樂事（哀情小說）不如歸〉，《申報》第2張第8版，1909年1月28日。

¹² 林紓：〈序〉，德富健次郎著，林紓、魏易重譯：《不如歸》（上海：商務印書館，

使商務印書館關於「哀情小說」的分類有所依託。同時，借助英譯本譯者與德富蘆花本人對小說寫作意圖的一再宣示——揭露「日本特有的家庭制度」帶來的「家長特權過度行使」的「惡行」，¹³ 林紓也因此讚揚作者撰寫小說「以為家庭之勸懲，其用意良也」（序頁1）。只是，與出版方及原作者的關切點仍然有很大偏差，如此動人的男女悲情故事與家庭悲劇並沒有占用林紓很多筆墨，或竟是一筆帶過。譯者顯然別有關懷，以致序文的主體令人意外地留給了對於甲午海戰的評述。

儘管如前所述，出於情節設置的需要，或者也可以說是基於暢銷書的品格，¹⁴ 《不如歸》中出現了日清戰爭具體場景的描寫。但還是應該承認，戰事並非小說敘述的重心，因此在篇幅上所占比例很小。實際上，除去片段的穿插，在全書總共二十五章（英譯改為二十七章，林譯同）之中，正面展開的戰爭敘述僅見於下篇第一章。而林紓作序時，卻撇開了家庭悲劇這條主線，專究心於「其中尚夾敘甲午戰事甚詳」（序頁1）的旁支，以致在近千字的序言裡，對戰爭的論述多達八百餘字，不可不謂畸輕畸重。

1908年初版，1914年新版），序頁1。後《不如歸》引文採隨文註，只標明卷頁，不另行作註。

¹³ 鹽谷榮、Edwin Francis Edgett〈前言〉（“Introduction”）：「由於日本特有的家庭制度，家長特權過度行使造成了許多惡行。如《不如歸》所描述的離婚問題，正是其中突出的一點。」（作者自譯）（Owing to a peculiar Japanese household system, many evils have resulted from an undue exercise of the prerogatives allotted to the head of a family. The question of divorce, as depicted in *Nami-ko*, is its salient point.）德富蘆花〈作者自序〉（“Author’s Preface”）：「當然，我是小說家而非改革者，我的目的並不是試圖用小說來改造我國的社會風俗。但是，對惡行的暴露往往能為其消除鋪平道路，我做到的或許比我已經認知的更好。」（作者自譯）（It was not, of course, my purpose to attempt to reform the social customs of my country by means of fiction, for I am certainly more novelist than reformer, but, as the exposure of an evil frequently paves the way for its destruction, I have perhaps builded better than I knew.）見 Kenjiro Tokutomi, *Nami-Ko: A Realistic Novel*, trans. Sakae Shioya and Edwin Francis Edgett (Boston: H. B. Turner & Co., 1904), vi, vii-ix。

¹⁴ 郭勇指出：「在《不如歸》這部小說中並置了戀愛、疾病、戰爭、家族制度這樣四個層面上的內容。」尤其是疾病與戰爭作為作者精心設計的兩個巧妙裝置，迎合了日本自明治以來日漸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使《不如歸》得以成為風靡日本半個多世紀的暢銷書。見郭勇：〈「暢銷書」的策略：透視《不如歸》的帝國主義話語〉，頁94-102。

若要探尋林紓所以偏重於此的原因，首先仍應回到英譯本的語境。

平心而論，在英譯本的序言中，譯者與作者的聲音並不一致。德富蘆花更多表現出人道主義者的同情心，故其〈自序〉中通篇所論，都在闡述日本社會所發生的「人性、自由、正義思想正日益取代陳舊的儒家倫理」的社會變革，希望西方的讀者能夠通過小說，對「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感覺，我們的想法和我們所經歷的鬥爭」有所關注。¹⁵而鹽谷榮雖然也提到了德富蘆花的「作品代表了純粹而簡單的人性」，讚揚《不如歸》的描寫「富於同情心和想像力」，但置於〈前言〉首位的卻是對日本戰勝中國的大力揄揚：

……《不如歸》一書的流行，還必須考慮另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即這部小說在現代日本文學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它體現了日本的騎士精神。1894-1895年的中日戰爭不僅是兩國發生衝突的歷史事件，也是日本第一次宣示其國家意識的存在和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可能性。……因此，基於書中武男和將軍（作者按：指浪子的父親片岡毅陸軍中將）兩個角色的愛國主義精神，《不如歸》一書對日本人民而言是珍貴的。¹⁶（作者自譯）

這樣一種對小說主旨的揭示，儘管沒有在德富蘆花的〈自序〉中得到響應，卻完全有可能在中譯本記述者林紓那裡激起回聲。

¹⁵ 德富蘆花 “Author’s Preface”: “the ideas of humanity, freedom, and justice are day by day displacing the worn-out Confucian ethics,” “I hope—serve to acquaint you who liv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acific with the manner in which we live, how we feel, and what we think, what struggles we are passing through, and so tend to tighten the bonds of sympathy between us.” Kenjirō Tokutomi, *Nami-Ko*, ix.

¹⁶ 鹽谷榮、E. F. Edgett “Introduction”: “The popularity of *Nami-ko*, however, must also be sought in another conspicuous fact, viz.: the novel stands unparalleled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in that it embodies the spirit of knighthood in Japan. The China-Japan War of 1894-95 was not merely an historical event in which the two nations came into conflict. It was the first case in which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its existence and possibilities as an independent nation asserted itself...*Nami-ko* is therefore dear to the Japanese people through the patriotic spirit of two characters—Takeo and the General.” Kenjirō Tokutomi, *Nami-Ko*, v-vi.

顯而易見，鹽谷榮自豪的是日本經由與中國的甲午一戰而崛起，這一對日本而言的榮耀，在戰敗國子民林紓的心中引發的卻是深重的國恥。以此，《不如歸》譯序的結尾充滿對國事的焦慮與激情：「紓年已老，報國無日，故日為叫且之雞，冀吾同胞警醒。恆於小說序中，攄其胸臆，非敢妄肆嗥吠，尚祈鑒我血誠！」（序頁3）只是，其於序文中所抒發之「胸臆」、所表露之「血誠」，固然包含了對「致敗」原因與「更革」之道的探討，卻終不及「若不勝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序頁1）的發端更令人印象深刻。

而最讓林紓悲情難抑的《不如歸》情節，主要發生在中譯本第十八章〈鴨綠之戰〉（日文原本為下篇第一章）。此章詳細敘述了1894年9月17日發生在黃海大東溝海面的中日海軍大戰，男主角武男被安置在日軍旗艦松島號上，在激戰中也身受重傷。德富蘆花本不曾親臨戰場，小說中所有關於甲午戰爭的描寫，除了憑藉當年的戰事報導，也源於作者寫作時有意的「補課」。為了求得真切的現場感，德富蘆花曾「前往橫須賀參觀軍艦，查閱海戰時在高千穗號上的金波樓主人所作《海戰日錄》」。¹⁷尤其是後書作者乃親歷黃海大海戰的日本海軍軍官小笠原長生（1867-1958），其戰況實紀為《不如歸》提供了諸多細節，由此使得這部小說的相關描寫具有了很高的寫實度。

一反此前批語甚少的前例，在第十八章短短一節譯文中，林紓總共寫了13處夾批與一段回末評。其中除了「中國水師將弁聽之」（卷下，頁18）、「中國政府聽之」（卷下，頁19）、「中國水師學生觀之，茲可學也」（卷下，頁26）一類的警示，以及批評提督丁汝昌（1836-1895）與總兵劉步蟾（1852-1895）的失誤外，林紓對小說記述的第三（原文分為三、四兩次）回合戰鬥尤為關注。

¹⁷ 德富健次郎、德富愛：《富士》第2卷（東京：福永書店，1926年），頁261。《富士》為德富蘆花所著自傳性小說。此條資料的使用受到了潘少瑜〈國恥癡情兩淒絕：林譯小說《不如歸》的國難論述與情感想像〉的啟發。又，本文日文資料的翻譯得到了陳愛陽博士的幫助，特此致謝。

依據《海戰日錄》的描寫，這一階段北洋海軍已開始落敗，殊死爭鬥的場面相當慘烈：

是より先き超勇亂射に逢うて見る見る沈没し、揚威も亦西北の
 淺瀬に向て逃遁なしければ敵軍稍崩れ立ちて陣列整はず、我軍之
 に撃じて益々奮闘し終に靖遠を撃沈め、旗艦定遠及來遠を燒き
 平遠致遠を大破せしむ、敵終に支ふる能はず總敗軍となりて四分
 五裂、濟遠、廣甲づ西南を望んで敗走し、五艦續いて陸岸に沿う
 て逃ぐ、止り戦ふ者定遠鎮遠のみ、本隊の五艦其周圍を旋回して
 砲撃すると頗る猛烈、定遠の火災彌甚しく船体黄煙に包まれて
 遂に運動自在なる克はず、然れ共此の二艦共厚さ一尺四寸の甲鐵
 なるを以て我彈丸の多くは打抜くと能はずして反射す、既にして
 敵最後の勇を鼓して本隊の左翼を衝き來る、我本隊之を避けて
 右方に回轉す、旗艦松島敵の大彈丸を受けしを事ともせず率先し
 て猶之に迫る。¹⁸

此時，先是超勇遭遇激射，眼見其沉沒，揚威亦向西北淺海處逃遁，敵軍開始混亂，陣列不整。我軍乘機益奮勇戰鬥，終擊沈靖遠（作者按：應為致遠），旗艦定遠及來遠起火，平遠、致遠（作者按：應為靖遠）重傷。敵終不能支，全軍敗退，四分五裂。濟遠、廣甲先望西南敗走，其餘五艦（作者按：應指靖遠、經遠、來遠、平遠與廣丙）隨即沿海岸線潰逃，死戰不退者唯定遠、鎮遠。本隊五艦環繞其周圍砲擊，頗為猛烈。定遠火勢愈甚，船體為黃煙包裹，已不能自如運行。然此二艦鐵甲厚達一尺四寸，我方砲彈多不能擊穿而遭反彈。雖已如此，敵仍鼓最後之勇，衝擊本隊左翼。我本隊避敵衝擊，向右方回旋。旗艦松島號被敵巨彈擊中，猶視若無事，率先向敵迫近。（作者自譯）

¹⁸ 小笠原長生：《海戰日錄》（東京：春陽堂，1896年），頁75-76。

林紆的翻譯雖則簡潔，但小說英譯本的意思均已大致含括：

超勇沈，揚威遁，致遠亦垂沈，定遠餘火尚蒸，來遠亦著火，遂不復成陣，則四面紛逃。獨二鐵甲巋然當羣鋒之中，未動。先鋒隊往追逃者，中軍隊專攻此二艦。定遠火雖未滅，仍不動。鎮遠亦不餒，協助其勢。此兩鐵山力支日本諸艦，無退衄意。顧日本之礮如回回輕刀，不入十字軍之重鎧，但在空氣自爆。（卷下，頁 26-27）

若回看原文，即可發現，自「定遠火雖未滅」以下，乃是小說敘寫的第四次交鋒。可以想見，林紆譯至此處，已覺間不容髮，故不願再以數計打斷對中國旗艦定遠與「善鬥」之鎮遠¹⁹二艘主力艦命運的關切。

不過，小笠原長生畢竟身處屬於第一游擊隊的高千穗號，對《不如歸》男主人公川島武男所在的旗艦松島號上的情況未必瞭如指掌。何況，戰鬥如此激烈，處於亢奮狀態的現場作戰者也不會分心留意時間刻度的變化。故小說中那些詳細的時刻記述並非全部出自《海戰日錄》，德富蘆花顯然別有採擇。以其中敘寫「三點半後，松島與鎮遠相距甚邇」的戰況為例：此時鎮遠開礮，「中武男之礮，礮炸」，武男中彈，「周身之左右皆血，人肉狼籍」，其長官大尉亦炸飛，「遮礮之鐵板已洞穿，見有藍物在外閃動，則海也」，「又聞焦爛之腥氣」及「四面呻吟之聲，木質為火所焚，爆爆作响」。（卷下，頁 27）這些在小笠原筆下只有「被敵巨彈擊中，猶視若無事」的簡況，在小說中已得到盡情的展現。除了作者的文學想像力，類似「三時半敵巨彈命中於松島，艦內火起，死傷頗多」²⁰的記載，在當日關於日清戰爭的各種紀實文字中實唾手可得。

應該說，德富蘆花自覺的寫實追求以及英譯本對小說真實性的強調，²¹

¹⁹ 田村維則編：《征清戰史》（東京：自刊本，1896年），頁 20b。

²⁰ 田村維則編：《征清戰史》，頁 20a。

²¹ 除封面上的注明，鹽谷榮在〈前言〉中也強調：小說暢銷的「原因在於故事完全真實，細節精緻純真，以及一系列忠實於當今日本生活的圖景。」（作者自譯）（The reason for this lies in the absolute truth of the story, in the careful and unsophisticated working out of details, and in its series of faithful pictures of Japanese

使林紓有理由充分信賴《不如歸》中的戰爭描述。其譯序中急欲申辯的「冤抑之情」，特別是輿論所指責的「渤海之戰，師船望敵而遁」，以上述情節為強有力的憑據，林紓也足可振振有詞地力加反駁：

余向欲著《甲午海軍覆盆錄》，未及竟其事。然海上之惡戰，吾歷歷知之。顧欲言，而人亦莫信焉。今得是書，則出日本名士之手筆。其言鎮、定二艦，當敵如鐵山；松島旗船，死者如積；大戰竟日，而吾二艦卒獲全，不燬於敵。此尚言其臨敵而逃乎？（序頁2）

以日本著名作家的戰爭敘述，彰顯中日海戰中中國海軍的將士用命、奮勇殺敵，林紓的用心可謂良苦。為此，他甚至進一步斥責：「吾國史家，好放言。既勝敵矣，則必極言敵之醜敝畏蕙，而吾軍之殺敵致果，凜若天人，用以為快。」（序頁2）對這種勝則蔑敵的史家筆法，林紓很不以為然，故轉而讚揚日人力求真實的戰事書寫：「若文明之國，則不然。以觀戰者多，防為所譏，措語不能不出於紀實。既紀實矣，則日本名士所云中國之二艦，如是能戰，則非決然遁逃可知矣。」（序頁2）對頑強的敵手表示尊重固然是日本的習俗，但顯而易見，林紓在此更看重的是日人小說所具有的來自敵方的鐵證效應，這令他大為興奮，心中壓抑的冤情亦可藉以紓解。

根據學界的研究，《不如歸》是林紓譯述的唯一一部日本小說。²²這當然有可能因為林紓的合作者中沒有人精通日文，而《不如歸》恰好有英譯本。不過，從林紓為此書所寫的文字聚焦於戰爭來看，特別是唯一一段回末評恰好出現在《鴨綠之戰》一章，重在以小說「和文、西文俱在，可考而知，天日在上，何可欺也」（卷下，頁28），回應國人對「水師之不武」（卷下，頁27）的譴責，即此已可斷言，《不如歸》有關黃海大海戰的細緻描述，實為吸引林紓投入翻譯的關鍵情節。而其心思所注，亦端在為北洋海軍洗刷恥辱、力證其怯敵為「謬言」（序頁2）。因此，即便《不

life of the present day.)

²² 參見張俊才：《林紓評傳·林紓翻譯目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86-287。

如歸》本文已明示，力戰到底的只有定遠與鎮遠二艦，其他各船或被擊沉，或受重創，多半則遁逃，林紓卻只注目於有利證據而不及反例，其為海軍辯誣心情之急切至此已昭然若揭。這也是林紓對「哀情小說」《不如歸》別有會心的原因。

二、古文家筆下的海軍戰記

由《不如歸》的譯序與回末評，明顯可見林紓痛心疾首於時人對海軍的責難，以致一再在書中表示，欲撰寫伸冤之作《甲午海軍覆盆錄》。²³此著雖終未成書，卻遺留下若干相關散篇。且譯作畢竟假手於人，不如自抒胸臆表達更為真切。何況林紓本以古文家自豪，自然也有意利用手中之筆，為中國海軍正名與鑄史。

諸文之中最早出現、也是林紓記述甲午戰爭最著名的篇章乃〈徐景顏傳〉。此文收入 1910 年 4 月由商務印書館刊行的《畏廬文集》。目前尚無法確定其具體寫作時間，但此集既為林紓「哀集五十八歲以前所為文」而成，²⁴該傳亦當作於 1909 年前。傳主徐氏同樣犧牲於甲午大東溝海戰，林紓的描述簡潔、生動：

徐景顏，江南蘇州人。早歲習歐西文字，肄業水師學堂。每曹試，必第上上。箏琶簫笛之屬，一聞輒會其節奏，且能以意為新聲。治《漢書》絕熟，論漢事，雖純史之家，無能折者。年二十五，以參將副水師提督丁公為兵官。壬辰，東事萌芽。時景顏歸，輒對妻涕泣，意不忍其母。母知書明義，方以景顏為怯弱，趣之行。景顏晨起，就母寢拜別，持簫入臥內，據枕吹之。初為徵聲，若泣若訴；越炊許，乃斗變為慘厲悲健之音，哀動四鄰。擲簫索劍，上馬出城。

²³ 第十八章〈鴨綠之戰〉回末評又稱之為《甲午海軍戴盆》。見《不如歸》卷下，頁 27。

²⁴ 朱義胄述編：《貞文先生年譜》（上海：世界書局，1949 年），卷 1，頁 46。

是歲，遂死於大東溝之難。²⁵

這段敘述完全出之以古文家筆法。在有限的篇幅裡，林紓提到了徐景顏的學西文與熟《漢書》，僅三言兩語，即勾勒出一位理想的儒將風采。而傳文的主體則用於鋪敘徐氏臨行前之「不忍」，雖對妻流淚，擔心的卻是其母失養，以極寫其孝思，由此愈見隨後毅然赴死之悲壯。

只是，這篇古文儘管動人，卻仍然留下了諸多「作文」的痕跡，引人遐想。古代固然有「《漢書》下酒」的佳話，不過，1895年時，林紓的讀書已經由博返約，每日「沈酣求索」、以為「古今文章歸宿者止此」的八種書中，便包括了《漢書》，²⁶可見徐景顏的愛好恰接近作傳者本人。尤其是文中反覆渲染徐氏的吹簫，使之成為全篇最奪目的情節，亦將情感的抒發推至高潮。而簫聲作為一種有效的裝置，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史記》所載高漸離的擊筑與荊軻的和歌，甚至相隔二千年的兩種樂音，同樣是從「徵聲」（《史記》為「變徵之聲」）的悲切轉為「羽聲」的慷慨，由此成功烘托出傳主別親赴難、捨生取義的烈士情懷。最終，徐氏的「擲簫索劍，上馬出城」，也一如荊軻的「就車而去，終已不顧」，²⁷實為承接前文順理成章的收束。至於徐氏在海戰中如何應敵、怎樣遇難，林紓此傳並無記載，也不是這篇古文關心的情節。

可以肯定的是，林紓在寫作〈徐景顏傳〉時，確實相當動情。可惜，他對其人並不熟悉，所記應得之傳聞，故不乏訛誤。首先是姓名即不準確。查考當年陣亡的將士名單，其中並沒有徐景顏；同樣，清末各海軍學校畢業生名錄中也不見其人。姓名相近者則有「來遠軍艦大副徐希顏」，為天

²⁵ 林紓：《畏廬文集·徐景顏傳》（上海：商務印書館，1910年），頁28ab。

²⁶ 張儔〈序〉述：「乙未（作者按：1895年）之秋，余守興化，延畏廬分校試卷。……稍檢其行篋，則所攜者《詩》《禮》二疏、《春秋左氏傳》、《史記》、《漢書》、韓柳文集及《廣雅疏證》而已。畏廬無書不讀，謂古今文章歸宿者止此。」見張儔：〈序〉，收於林紓：《畏廬文集》，頁1a。

²⁷ 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86，頁2534。

津北洋水師學堂駕駛班第二屆學生。²⁸ 由海軍老人池仲祐（1861-?）1926年完成的〈海軍戰役陣亡死難羣公事畧〉，收入的人物也只有徐希顏（字少泉），²⁹ 並無徐景顏。而由於林紓的誤記，為後來者帶來不少困擾。如1944年印行的地方誌《鄉志類稿》，即並列「徐景顏」與「徐樑字希顏」，事蹟分別取自林紓〈徐景顏傳〉與「家述」。至2007年出版的《東山名彥——蘇州東山歷代人物傳》，徐景顏更被記述為徐希顏的族兄。但所謂「甲午海戰兩英烈」³⁰，其實本是一人。1931年，王蘧常（1900-1989）撰寫〈甲午死難將士題名記〉時，已將其合而為一：

徐景顏 來遠艦魚雷大副，右翼左營守備。或作希顏，原名樑。蘇州人。中砲陣亡。詳林紓〈徐景顏傳〉，羅邕〈徐希顏家傳〉。³¹

以研究甲午戰爭聞名的戚其章（1925-2012），也視二徐為同一人，所著〈甲午戰爭海軍人物傳〉，便單為徐希顏立傳，乃至將林紓的〈徐景顏傳〉也直接寫作〈徐希顏傳〉，傳文亦係糅合林、池二傳而成。³²

其次，關於徐希顏的年齡，也與林紓所記徐景顏有出入。羅邕撰寫的家傳應是最權威的文本，記云：

初少泉之投考北洋水師學堂也，校中定例，投考年齡，須在十六以上。時少泉年僅十一，恐遭拒絕，乃偽稱丁年，始得入校。及遇難，年僅二十有二。因報名時誑增四歲，遂從之稱二十六歲云。³³

²⁸ 池仲祐編：《海軍實紀：述戰篇》（下）（北京：海軍部，1926年），〈甲午戰事紀·陣亡將士姓名〉，頁23a；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海軍各學校歷屆畢業生名冊〉，頁440。

²⁹ 見池仲祐編：《海軍實紀：述戰篇》（下），〈海軍戰役陣亡死難羣公事畧·徐都戎少泉事畧〉，頁26ab。按，池仲祐，名滋鏗，以字行。

³⁰ 葉承慶纂輯：《鄉志類稿·人物類七·義行》，收於《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8》（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198；楊維忠編著：《東山名彥——蘇州東山歷代人物傳》（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7年），頁317-318。

³¹ 王蘧常：〈甲午死難將士題名記〉，《申報》第17版，1932年1月8日。

³² 〈甲午戰爭海軍人物傳·徐希顏〉，見戚其章：《中日甲午戰爭史論叢》（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年），頁355-356。

³³ 引據吉羊撮錄之友人羅邕所撰〈徐希顏家傳〉，見〈甲午中日之戰中之中國一

以此，參考「家述」的《鄉志類稿》與之全同，池仲祐〈徐都戎少泉事畧〉敘其犧牲年齡亦為二十二歲，惟入學年齡改為十三歲。而無論十一抑或十三，以此幼齡就讀水師學堂，當然不可能精熟《漢書》。其嗣後的學習也限於西文及與輪船駕駛相關的科目，³⁴畢業後雖可利用閒暇讀書，畢竟並非專攻，謂其能夠論漢朝事勝過純史家，實在難以令人相信。或許因此，池傳雖稱其「幼穎異，有神童之目」，³⁵卻於通《漢書》隻字未提。

最後，吹簫一節誠然產生了非常感人的效果，卻僅見於林紓筆下。比較其他兩種傳記，池文中別記：「中日大東溝之役，軍艦昕夕備戰。都戎馳書告母，謂以身許國，盡忠不能盡孝；又寄書於妻，勗以事母。蓋其志早已矢死矣。」³⁶所言當更近史實。羅邕〈家傳〉的敘事則竟有與林文相左處：

十九年冬，應母招回南，娶妻翁氏。婚後二月，中日之釁起。少泉欲北上，家人親屬咸勸阻之，以為中之與日戰，猶之以卵撞石，無不敗者，參與其間，徒傷其命耳。少泉毅然曰：「余之得有今日，何一不受國家之賜！今國事方艱，若不捨命向前，雖留此身，將何顏以對人耶？」遂北上。³⁷

雖然以當日國人對日本的瞭解，尚不致有「以卵擊石」之比，然而，作戰必有傷亡，包括母親與妻子在內的家人「咸勸阻」，亦屬人之常情。這裡，

健兒〉，載《申報》第11版，1931年10月6日。

³⁴ 如徐希顏光緒二十年（1894）以虛齡二十二歲殉難，則光緒十三年（1887）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時，應為十五歲。在學至少四年，其入學年齡當以十一歲為是。另，北洋水師學堂之學習年限與教學科目，一併參見〈天津水師學堂歷屆畢業生名單〉、〈《北洋海軍章程》招考學生例〉，高時良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頁446、438-442。

³⁵ 池仲祐編：《海軍實紀：述戰篇》（下），〈海軍戰役陣亡死難羣公事畧·徐都戎少泉事畧〉，頁26a。

³⁶ 池仲祐編：《海軍實紀：述戰篇》（下），〈海軍戰役陣亡死難羣公事畧·徐都戎少泉事畧〉，頁26a。

³⁷ 吉羊：〈甲午中日之戰中之中國一健兒〉，《申報》第11版，1931年10月6日。

「婚後二月」³⁸即毅然出征，戰死疆場，方為徐氏人生中最閃光的片段。

由此可以引出的推想是，林紓關於徐氏年齡的記載，乃襲用當時外間傳言，故述其陣亡時，至少已有二十五歲。又將個人的喜好加諸傳主，並與「《漢書》下酒」一類古人的豪情逸興相結合，用以凸顯徐氏的儒雅。至於簫音的加入，則讓人聯想到劍氣簫心、劍膽簫心等詞語所指代的文武兼備的才士，林紓所要塑造、彰顯的正是這樣的人物。只是，儘管形象完美，無奈已非徐氏本人。因而，〈徐景顏傳〉終究還是一篇精心結構的古文，卻未必能夠依為信史。

其實，對於林紓而言，更重要的還在以徐傳引出心中鬱積之言，因此才有後半篇幅幾與本傳相當的「論曰」。林紓在其中又舉出「閩人」林履中（1852-1894）與楊用霖（1854-1895）從容戰死的事例，以反駁「以威海之役，詆全軍無完人」的「恆人論說」。其質疑徐、林、楊「三公之死節，亦不之數矣」的抹煞英烈，將導致「忠義之士又胡以自奮也耶」³⁹的嚴重後果，自然算具遠慮。但明眼人如錢基博（1887-1957），1930年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中議此文，仍謂為「以中日之戰，海軍敗績，用叢話厲；傷毀者之例以一概也，作〈徐景顏傳〉」，⁴⁰確實深中肯綮。也即是說，與《不如歸》譯序相同，縈繞林紓心頭的始終是海軍蒙受的冤情。

而徐希顏戰死經過，儘管依據古文謀篇布局的章法，本可一筆帶過。但若作為歷史文本閱讀，池仲祐所記無疑更可取。文述其「戰時奮不顧身，發礮重創敵艦。而敵彈飛來，腿折暈絕。同艦士卒正在酣戰，不及救治，血流如注，氣竭而亡」，⁴¹將其戰場表現逐一道來。《鄉志類稿》又補充

³⁸ 《鄉志類稿》述徐希顏「中東之戰起，時甫成婚二月，遂挺身北上」，與羅邕〈徐希顏家傳〉同。見葉承慶纂輯：《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 8》，頁 198。

³⁹ 林履中，字少谷；楊用霖，字雨臣，林紓誤記為雨亭。見林紓：《畏廬文集·徐景顏傳》，頁 28b。

⁴⁰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長沙：嶽麓書社，1986年），頁 192。

⁴¹ 池仲祐編：《海軍實紀：述戰篇》（下），〈海軍戰役陣亡死難羣公事畧·徐都戎少泉事畧〉，頁 26ab。

了「遺骸與碎艦為礮力拋擲數里外荒島上，事後歸葬」，⁴²戰事之殘酷亦可得見。而以這些敘寫殿後，徐氏捐軀報國之勇烈事蹟才能夠完整呈現。

此後，大約 1921 年，林紓又因楊家後人的請託，續撰〈清建威將軍提督銜補用副將閩縣楊公墓誌銘〉，墓主即〈徐景顏傳〉中一併論及的楊用霖。此文也主要敘述甲午年的大東溝與威海兩役。其時，楊用霖任鎮遠艦幫帶大副，而鎮遠在大東溝之戰中的表現，甚至贏得了來自敵方的讚譽，前引《征清戰史》與《不如歸》的文字已足可證明。既然鎮遠在此戰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林紓的文章作法因此也異於〈徐景顏傳〉，而將更多筆墨用來鋪陳楊氏的戰績。

林紓顯然偏愛文才武略兼具的軍官。墓誌中述楊用霖雖非水師學堂出身，而是直接投身海軍，在艦艇上習練、升遷，但「治事之暇必讀書，書積其臥內，恆加丹黃」。這在海軍將士中應不多見。以此得到其時負責訓練北洋水師的英國海軍軍官琅威理（William M. Lang, 1843-1906）的欣賞，「偉公有文武才，謂進而不止者，則亞洲之訥爾遜也」。而訥爾遜（Horatio Nelson, 1st Viscount Nelson, 1758-1805）為英國海軍名將，創造了不少經典戰例，在英國軍事史上幾成神話。如此期許，可見楊氏指揮作戰確富謀略。同時，林紓亦將古代名將如李廣（?-119B.C.）愛兵如子的美德加諸墓主：「公撫愛所部如家人，疾病必自臨存，以故士咸為用。」⁴³精研兵事，深得軍心，楊用霖因此有望成為傑出的將才。

甲午戰起，在黃海與威海兩次戰役中，楊用霖果然都有出色表現。林紓一一分述：

秋八月，遇敵於大東溝。公謂所部曰：「戰不必捷，然此海即余死所。能死者往，餒則聽之。」衆皆泣曰：「將軍誓死，吾輩寧以生

⁴² 葉承慶纂輯：《鄉志類稿·人物類七·義行》，收於《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 8》，頁 198。

⁴³ 林紓：《畏廬三集·清建威將軍提督銜補用副將閩縣楊公墓誌銘》（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 年），頁 42b。

為？請舉軍為將軍死！」既接，主者不習兵，聚艦為方陣，敵分行夾擊，二舷之礮不能趣敵。定遠中礮火發，公轉舵遮其前，受敵礮。然鎮遠礮巨，且命中，敵少卻，定遠遂得撲熄其火。時艦中積尸交前，公挺立指揮不為動。⁴⁴

此戰因鎮遠與敵纏鬥，保護了旗艦定遠號，二艦方得以安全撤出。但在返航威海時，鎮遠不幸觸礁，管帶林泰曾（1851-1894）引咎自殺，楊氏代理其職，督率士兵奮力修艦。然終因威海岸上礮臺全部失守，海軍戰無可戰，楊用霖毅然以手槍自殺而不肯投降。林文記其死事也足夠壯烈：

已而，南北岸礮臺陷於敵手，敵礮據高臨下，舉軍莫支。提督丁公汝昌、右翼總兵劉公步蟾均仰藥死。公尚欲以礮仰攻礮臺，願諸艦為魚雷陷沒者半矣。公喟然誦文信國（作者按：即文天祥）臨命詩，出手槍啣而仰發之，腦漿自鼻竅下垂如玉筋，端坐不仆，見者神之。⁴⁵

其細節描述與〈徐景顏傳〉「論曰」所記相近，惟「端坐不仆」後，徐傳作「日人驚以為神」，⁴⁶顯示了日本軍人對戰死者的尊敬，與小說《不如歸》如出一轍。煞尾的銘文更為楊用霖生前未能盡展其才而抱憾：「公宜特將，顧乃偏福；沈勇大慮，孰步公武？」⁴⁷此「亞洲之訥爾遜」受制於時勢、機遇，竟至過早折損，林紆的痛惜亦情見乎辭。

由於林紆所撰墓誌銘對楊用霖的生平大節均有記述，故池仲佑〈楊鎮軍兩臣事畧〉即大體承襲林作。其間也略有補充，值得一表的，一是言楊用霖十八歲「充藝新軍艦為學生」，跟從管帶許壽山（1852-1884）所習，除林紆提及的「駕駛、槍礮之學」，又多出「英國語言文字」，這為其嗣

⁴⁴ 林紆：《畏廬三集·清建威將軍提督銜補用副將閩縣楊公墓誌銘》，頁 42b。

⁴⁵ 林紆：《畏廬三集·清建威將軍提督銜補用副將閩縣楊公墓誌銘》，頁 42b。

⁴⁶ 林紆：《畏廬文集·徐景顏傳》，頁 28b。

⁴⁷ 林紆：《畏廬三集·徐建威將軍提督銜補用副將閩縣楊公墓誌銘》，頁 43a。

後「隨赴英國購買艦械」以及得琅威理賞識埋下伏筆；一是稱說其赴義後，「遠邇驚傳其事，喪歸之日，道旁觀者衝塞，有歎息泣下者」，⁴⁸足見其死節感人至深。而池氏〈海軍戰役陣亡死難羣公事畧〉以楊傳收尾，也有意把最高的敬意留給其人，故開篇即道：「清光緒二十年甲午中日大東溝之戰，我國海軍將士多死難者。而殉節之慘烈，則以護理北洋左翼總兵楊公為最。」⁴⁹於此可知楊氏在北洋海軍中威望之高。

而敘述撰文緣起時，林紓尚提及，當年海軍總長劉冠雄（1861-1927）曾請他修撰《甲申甲午海軍殉難諸臣傳》，因各家子弟未提供行略，「史乃弗就」。於是感慨：「不圖七十之年，乃為公補此銘也。」⁵⁰顯而易見，楊用霖墓誌銘之作，在林紓僅是稍償夙願而已。

《甲申甲午海軍殉難諸臣傳》雖不成，七十一歲之年，林紓卻在《禮拜六》雜誌發表了〈記甲申馬江基隆之敗〉一文，證明為清末海軍撰史是其念茲在茲的心事。這篇1922年刊出的文章，題目寫的是「甲申」，但亦涉及「甲午」，實更接近於劉冠雄所託。其敘1884年中法海戰，關注點仍在海軍人才。故篇首「畏廬老人曰」，第一句講的即是「中國非無人才也」，於是從左宗棠（1812-1885）創立福建船政局、設立船政學堂說起。其中，前學堂培養出的製造人才，「如陳鶴亭（作者按：名兆翹）、魏季渚（作者按：名瀚）、鄭景溪（作者按：名清濂），皆鉤心鬥角，奇巧幾出西人之上」，⁵¹而多半受到讒毀、摧折；後學堂訓練出的駕駛人才，則在甲申、甲午兩戰中犧牲慘重。

雖然不能像前引徐、楊兩篇傳誌那般情節豐富，林紓在〈記甲申馬江基隆之敗〉中仍不忘為戰死者留名。其寫葉琛（?-1884）、許壽山、陳英

⁴⁸ 池仲祐編：《海軍實紀：述戰篇》（下），〈海軍戰役陣亡死難羣公事畧·楊鎮軍雨臣事畧〉，頁44b。

⁴⁹ 池仲祐編：《海軍實紀：述戰篇》（下），〈海軍戰役陣亡死難羣公事畧·楊鎮軍雨臣事畧〉，頁43a。

⁵⁰ 林紓：《畏廬三集·清建威將軍提督銜補用副將閩縣楊公墓誌銘》，頁43a。

⁵¹ 林琴南：〈記甲申馬江基隆之敗〉，《禮拜六》第159期，1922年4月，頁8。

(?-1884) 三位管帶英勇捐軀事，已開海軍諸公殉難之先聲：

而法大將孤拔……戰書甫及於張簧需〔齋〕（作者按：即張佩綸）欽使，張未及報，法艦桅上之機關槍已如雨下。可堂力發一礮，越其將台而過，弗中，而可堂中彈立殞。玉珊發令起貓〔錨〕，彈即及其將台。玉珊力發二礮，洞其一艦，然流彈及其顛矣。貽蕙〔惠〕據艦受彈弗避，連發五礮，而敵彈已中火藥艙立焚，岸上人尚見貽蕙〔惠〕立火中不仆。嗚呼勇矣！⁵²

其時形勢為法軍貼近偷襲，清軍艦艇尚下碇停泊，倉促應戰，幾無還手力。三人猶能拼死開礮，雖敗猶榮。特別是陳英，林紆的刻畫已如狀寫楊用霖般具有雕像意味；池仲祐更記：「其僕請曰：『伏波、藝新兩船已向 upstream 開駛，盍從之？』君瞋目叱曰：『欲我走耶？大丈夫食君之祿，宜以死報。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鼓輪轉舵，貫陣而擊以左右礮。」⁵³ 因此役不同於黃海的與敵遭遇，開戰即知敗局已定，故諸人的死難愈令人悲慨。

〈記甲申馬江基隆之敗〉兼及甲午之戰處，如謂：「駕駛諸將，為余所識者如方繹〔益〕堂，許至〔玉〕珊，葉可堂，陳貽蕙〔惠〕，林少谷，楊雨亭〔臣〕，皆精良之選」。「許、葉既殉甲申之難，而林、楊諸君，亦殉甲午之難於威海」，⁵⁴ 使得原本人才輩出的局面轉眼凋零，海軍亦一蹶不振。其中，林少谷本名履中，為揚威號管帶。在大東溝海戰中，揚威與超勇最先中礮，林亦隨船自沉。林紆於〈徐景顏傳〉嘗記其事：

余戚林少谷都督於大東溝之戰，所領兵艦碎於敵礮，都督浮沈海中。他舟曳長繩援之，都督出半身推繩，就水上拱揖，俾勿援。如是三四，終不就援以死。⁵⁵

⁵² 林琴南：〈記甲申馬江基隆之敗〉，頁 8-9。

⁵³ 池仲祐編：《海軍實紀：述戰篇》（下），〈海軍戰役陣亡死難羣公事畧·許游戎玉珊事畧（陳、葉附）〉，頁 21a。

⁵⁴ 林琴南：〈記甲申馬江基隆之敗〉，頁 8、10。

⁵⁵ 林紆：《畏廬文集·徐景顏傳》，頁 28b。

其赴死經過與致遠管帶鄧世昌（1849-1894）相似。此一誓與戰艦共存亡的氣概固然可歌可泣，但從愛惜人才的角度，所謂「兵船猶可驟添，將才殊難猝致」，海軍提督丁汝昌因此頗感焦慮。黃海戰後，丁即上書李鴻章（1823-1901），在肯定鄧世昌「忠勇性成」的同時，也擔心「諸將狃於聞見，但以輕生為烈」，故擬定〈海軍懲勸章程〉，建議凡「前敵衝鋒盡力攻擊者」，「雖軍艦沈焚，而船中將士遇救得生，准免治罪，仍予論功」。⁵⁶ 諸人之中，只有濟遠管帶方伯謙（1853-1894）是因黃海之戰臨陣脫逃而遭處決。林紓卻仍為其鳴冤，述方「單舸與日艦吉野遇，回礮擊其將台，竟脫然歸威海」，本來應是有功；被斬乃是由於「見惡於大帥，鍛煉其獄」，⁵⁷ 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總之，在林紓筆下，無論馬江還是大東溝、威海海戰，海軍將士無不是英勇作戰，以身報國。至於敗績的原因很多，有來自朝廷的挾制與前敵指揮的失誤，如「逆旨切勒閩帥，必候敵人先發始迴礮應之」，⁵⁸ 又「軍機遙制，主將不知兵事」，對丁汝昌尤多切責；⁵⁹ 他如岸礮先潰，軍艦屏障盡失；「海軍應備之物，節節為部議抑勒，不聽備」（序頁1）；以及〈記甲申馬江基隆之敗〉揭出的因福建船政無「購船回扣之利」，⁶⁰ 招來嫉恨與譏謗等。所有諸說，都在力圖證實海軍的戰而不勝，「非戰之罪也」。

三、鄉情與海軍情結的關合

眾所周知，林紓為福建閩縣（今福州）人。他之所以對海軍如此關

⁵⁶ 李鴻章奏：〈奏海軍懲勸章程片〉（光緒二十年九月初七日），收於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頁516-517。

⁵⁷ 林琴南：〈記甲申馬江基隆之敗〉，頁8。

⁵⁸ 林琴南：〈記甲申馬江基隆之敗〉，頁8。

⁵⁹ 《不如歸》第十八章夾批謂：「日本當日戰艦皆木質，至以商舶為之；吾威海之艦有數鐵甲，乃屬之丁汝昌，坐令全師敗衄。汝昌一死，即可云殉節耶？」（卷下，頁18）

⁶⁰ 林琴南：〈記甲申馬江基隆之敗〉，頁10。

切，鉤稽其生平交遊，可知福建船政局（包括船政學堂）在其中的重要性。福建船政局原本是由閩浙總督左宗棠提議，於 1866 年 7 月始創。而剛剛開始籌建，10 月間，左氏即調任陝甘總督，故推薦沈葆楨（1820-1879，福建侯官人）繼任。建廠之初，同年 12 月，船政學堂便開始招生，並於 1877 年派出第一批留歐學生。⁶¹ 此為中國近代第一所培養海軍專業人才的學校，成才甚多。

由於船政局與學堂均在福州，同居一城，並且不乏戚屬之誼，林紆與其中多人交往密切。如 1897 年林紆第一部著作《閩中新樂府》行世，為之作序且出資刻印的魏瀚（1850-1929）；1899 年林紆第一部翻譯小說《巴黎茶花女遺事》印行，與之合作、擔任口譯的王壽昌（1864-1926）；使得林紆與商務印書館長久結緣的高鳳謙（1870-1936），及其次兄高而謙（1863-1918），三人均為福建船政學堂製造班早期學生。四十七歲離開家鄉之前，林紆與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們相聚情形，高鳳謙 1926 年曾有回憶：

甲午之役，我師敗於日本。國人紛紛言變法，言救國。時表兄魏季子（作者按：指魏瀚）主馬江船政局工程處。余館其家，為課諸子。仲兄子益先生、王子仁先生，歐游東歸，任職船局，過從甚密。伯兄嘯桐先生（作者按：名鳳岐），林畏廬先生，亦時就游讌，往往互數日夜，或買舟作鼓山、方廣游。每議論中外事，慨歎不能自己。⁶²

儘管時間已過去將近三十年，高氏卻記憶猶新。

而諸人之中，林紆與高氏兄弟尤為親密。1914 年為三兄弟的父親作傳，林紆已直陳：「紆之於鳳岐、而謙、鳳謙三人，非朋友，直骨肉耳。」這一自童年結下的至情，⁶³ 林紆終身持之不渝。三高中，長兄鳳岐 1909 年

⁶¹ 參見林慶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6、10、30-31、35。

⁶² 高夢旦：〈《閩中新樂府》書後〉，收於朱羲胄述編：《春覺齋著述記》（上海：世界書局，1949 年），卷 2，頁 5。

⁶³ 林紆：〈高莘農先生傳〉，《畏廬續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 年），頁 45b。文中述：「前三十年，匪日不朝先生於東城。先生及程夫人留紆累日，燕

最早去世。此後每逢其生日，林紓必在家中設祭，至 1923 年，林紓已行禮十三次。⁶⁴ 而一年後，林紓本人亦辭世。對於 1919 年故去的高而謙，林紓則至少寫下過〈送高子益之官雲南序〉、〈祭高子益文〉與〈高子益哀辭〉三篇古文。林作〈氣箴〉與〈言箴〉自警，小序中也道出乃是因其言肆氣張、貧賤驕人，「良友高子益而謙至於把吾腕，痛哭力諫」，令林紓感激莫名：「私計天下之愛惜其朋友者，仁至義盡，無如吾子益者矣。」⁶⁵ 此所以為道義交。

不只是重情的林紓珍視這份早年培育的感情，來自同鄉的友情也確實伴隨了其一生。林紓日後的到杭州、居北京，也都與這批福建鄉親關係密切。1898 年至杭州以及次年的移居，即與在杭輔佐知府林啟創辦新式學堂的高鳳岐招邀有關。⁶⁶ 1901 年後，林紓定居北京，其所往還的群體仍以福建人為主。1913 年起，家累甚重的林紓得到了時任北洋政府海軍總長的劉冠雄幫助，每月贈送乾薪一百元，⁶⁷ 而劉氏本為福建船政學堂駕駛班第四屆學生。晚年林紓很大一部分收入來自譯書與編書，在商務印書館由國文部長做到編譯所所長、出版部長的高鳳謙，自是「林譯小說」及諸多古文集選評落戶商務的主要推手。而 1914 年，林紓發起組織由 16 位

聚如家人，紓亦視先生及程夫人為吾世父世母也。」高父卒於 1884 年，林紓生於 1852 年。

⁶⁴ 林紓〈與陳謝二君書〉有云：「每年八月十三日為媿室（作者按：高鳳岐號）生辰，吾必具酒饌邀其在京之學生，雅集敞齋祭奠，匆匆十三年矣。」此信中言「弟明年七十有三矣」，因知其寫於 1923 年。見林紓著，李家驥、李茂肅、薛祥生整理：《林紓詩文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年），頁 351、350。

⁶⁵ 以上引文，見林紓：《畏廬續集·二箴·并序》，頁 44a。

⁶⁶ 林紓作《蜀鵲啼傳奇》第一齣〈雲約〉，主人公連書（作者按：諧音林紓）自白：「近蒙迪老、媿老（作者按：分指林啟與高鳳岐，因林啟字迪臣，高鳳岐號媿室。）見招，掌教東城講舍。」乃紀實。林紓：《蜀鵲啼傳奇》（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 年再版），頁 2。

⁶⁷ 林紓〈訓林璐書〉（1913 年 10 月 23 日）提到：「劉子英請我為書啟老夫子，每月致送一百元，並不到衙門，亦無官之名目，亦不是秘書，是私自出資送我，尚可為也。」見林紓著，夏曉虹、包立民編注：《林紓家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年），頁 53。又，1918 年，林紓曾受劉冠雄之邀，為撰〈鳳岡劉氏族譜序〉，初刊《公言報》，1918 年 7 月 6 日，收於《畏廬三集》，頁 4a-5a。

同鄉結成的晉安耆年會，⁶⁸ 成員居首者為前清翰林院侍講、曾任宣統皇帝（1906-1907）師傅的陳寶琛（1848-1935），此為林紓最敬重的鄉賢。其他如嚴復（1854-1921）、卓孝復（1855-1930）、陳衍（1856-1937）、力鈞（1855-1925）、張元奇（1858-1922）等，均與林紓私交甚深。就中，被稱為「譯才并世數嚴林」⁶⁹ 的嚴復，乃船政學堂駕駛班第一屆學生，林紓自承與之「為誼三世」。⁷⁰ 可見，無論生活在何處，閩人均為林紓最可靠的憑依。

上舉各人固然與林紓有較長時間的交往史，若限於中法、中日之戰，其中死難與被殺者中，實際也多有林紓的舊識。前述〈記甲申馬江基隆之敗〉一文中，林紓即自陳與方伯謙、許壽山、葉琛、陳英、林履中、楊用霖這些學駕駛的菁英相識。而除楊氏外，其他五人均出身船政學堂。戰死於大東溝的林履中更為其親戚。林紓為楊用霖做墓誌銘，亦提及：「余年三十已耳公名，聞公殉難，曾以詩挽之。」⁷¹ 可見諸人的死難，對林紓確實造成了很大的情感刺激。故言及甲申與甲午兩次戰爭，林紓傷心的也是「文襄（作者按：指左宗棠）、文肅（作者按：指沈葆楨）所教育之人才，至是幾一空焉。」（序頁2）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犧牲，卻因戰敗而飽受譏責，林紓自然要為包括福建鄉親在內的海軍將士鳴不平。

不過，林紓一再為海軍鳴冤叫屈，在當時的文人群體中還是顯得相當特殊。如與黃遵憲（1848-1905）關於甲午戰爭的一組歌行體詩作比較，可以看得更清楚。〈東溝行〉的斥責——「從此華船匿不出，人言船堅不如疾，有器無人終委敵」；〈哭威海〉的感歎——「噫吁戲！海陸軍，人力合，我力分」；〈降將軍歌〉的嘲諷丁汝昌——「已降復死死為誰」，⁷²

⁶⁸ 參見林紓：《畏廬續集·晉安耆年會序》，頁11b-12b。

⁶⁹ 康有為：〈琴南先生寫《萬木草堂圖》，題詩見贈，賦謝〉，《庸言》第1卷第7號，1913年3月，「詩錄」，頁1（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

⁷⁰ 林紓：《畏廬文集·江亭餞別圖記》，頁56a。

⁷¹ 林紓：《畏廬三集·清建威將軍提督銜補用副將閩縣楊公墓誌銘》，頁43a。

⁷² 黃遵憲：〈東溝行〉、〈哭威海〉、〈降將軍歌〉，收於黃遵憲著，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650、656、683。

其間雖然也涉及海軍與陸軍的矛盾，但貫穿前後的嘲弄基調，已明白顯出黃遵憲對海軍無能的判定與憤激。而林紓所取與眾不同的姿態，雖然同死難者的情感繫連有關，卻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

需要說明的是，儘管福州之外，清政府還在各地設有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廣東水陸師學堂、江南水師學堂等；但由於福建船政學堂開辦最早，且派出大批學生留學國外，因此，福建船政局與船政學堂，也最有資格稱為「中國近代海軍的搖籃」。從這裡走出的人才，已然成為中國近代海軍的骨幹。以隨後開設的各學堂執教者而言：

李鴻章辦天津水師學堂，選嚴復為總教習，後為總辦。曾國荃辦南京水師學堂，首位總辦沈瑜慶（沈葆楨之子），後位總辦蔣超英亦皆閩人。張之洞辦廣東黃埔水師學堂，先用船政提調吳仲翔為總辦，後用林賀峒（林則徐〔作者按：福建侯官人〕之孫）及魏瀚等，不但用船政學生，且用閩人與船政有關係的。

按照海軍老人林獻忻（1883-1960）⁷³的說法，福建、天津、廣東、南京四校，再加上薩鎮冰創辦的煙臺海軍學校，晚清在各省所辦海軍學堂共五所，「五校共畢業駕駛、管輪、製造及無線電班學生等，計二千多名，其中閩籍約占七、八成之多。至於艦艇上水兵，閩籍亦占七、八成」。⁷⁴林氏因此撰寫了題為〈中國海軍職業何以閩人獨多〉的文章。由此可見，清末海軍的榮辱本與福建緊密相連。

此一關聯，在福建省籍的海軍將士身上體現尤為明顯。民國成立後，1912-1919年任海軍總長的劉冠雄⁷⁵便一直有心為海軍修史。林紓也嘗受其

⁷³ 林獻忻於1899年入學北洋水師學堂。

⁷⁴ 林獻忻：〈中國海軍職業何以閩人獨多〉，收於張俠等編：《清末海軍史料》，頁605。

⁷⁵ 即使民國建立後，北洋政府設有海軍部的年代（1912-1927），海軍總長除廣東人程璧光在位一年，其他時間均由閩人充任，依次為劉冠雄、薩鎮冰、李鼎新、杜錫珪、林建章，而程璧光亦畢業於福建船政學堂。見錢實甫編著，黃清根整理：《北洋政府職官年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4-31、248、254、264、274、275。

委託，欲撰《甲申甲午海軍殉難諸臣傳》。此書雖未成於林紓之手，然而，同樣出身福建的池仲祐終得代完其志。池氏也是「弱冠從事海軍」，1881年即曾以文案身分，隨丁汝昌、林泰曾、鄧世昌、楊用霖等去英國接超勇、揚威二艦回國。此行所著《西行日記》，當初便由林紓作序，1904年又為撰〈書後〉。以此資歷，加之自言：「平生尚氣誼，喜朋交，申、午兩役死綏將士，多與賤子雅有情愫」，故池仲祐久懷「表彰忠烈之微忱」。⁷⁶在林紓病逝兩年後，即1926年，由池氏撰寫的《海軍實紀：述戰篇》印行，附錄中恰有〈海軍戰役陣亡死難羣公事畧〉。劉冠雄為該書作序，也特別就甲午海戰潰敗、「咎海軍不振」而力加辯駁。末後以倖存者的身分慨言：

至附列陣亡死難人員事略，表彰忠烈，尤後死者之責也。海山蒼蒼，海水茫茫，安得泛葉舟、携杯醕，重向洪濤澎湃中，一哭我袍澤諸故人也。悲夫！⁷⁷

在甲午之戰中，身為靖遠號幫帶大副的劉冠雄同樣經歷了殊死的搏殺。以此，這段憑弔戰友的文字寫得格外動情。

儘管並非同袍，但由於生長福建，又與船政學堂多人交誼深厚，海軍之於林紓，也自然生出榮辱與共的深切同情。而從清末的鄉土教材中，已分明可見「海軍人材獨多於他省」⁷⁸乃是一種引為自豪的地方知識。這份特有的光榮與驕傲既然深植人心，閩人也就註定要為戰敗承受更多的壓力。即便打敗仗的為北洋水師，受責難的照樣是福建人，這就是成為海軍主體的代價。如此才可以理解林紓為何會在《不如歸》中將海軍與閩人劃

⁷⁶ 池仲祐：《海軍實紀：述戰篇》（下），卷末〈附識〉，頁1-2；池仲祐：《西行日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08年初版），收於陳悅主編，吉辰譯注：《龍的航程：北洋海軍航海日記四種》（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3年），頁17-76。

⁷⁷ 劉冠雄：〈序〉，收於池仲祐：《海軍實紀：述戰篇》，頁1b。

⁷⁸ 佚名：〈船政局的鄉土教材〉，收於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林萱治主編：《福州馬尾港圖志》（福州：福建省地圖出版社，1984年），頁376。此則原題「船政局」，取自1926年福州重印本《福建鄉土教材書》第二冊。該書光緒年間編成，晚清已印行四版。

了等號：

甲午戰事，人人痛恨閩人水師之不武，望敵而逃。余戚友中殉節者，可數人，死狀甚烈，而顧不能勝毀者之口。欲著《甲午海軍戴盆》以辨其誣。今譯此書，出之日人之口，則知吾閩人非不能戰矣！（卷下，頁 27）

接下來的一句「若云林紓譯時，為鄉人鋪張」（卷下，頁 27-28），實已明白透露出此中的鄉情。因而，為海軍辯誣，也就是為閩人辯護。這也使得林紓不可能像廣東嘉應州人黃遵憲一般以決絕的態度貶斥海軍。

應該承認，家鄉在林紓的情感世界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即便晚年定居北京，此心亦未嘗稍變。其言：「紓自計身為閩人，能盡力為鄉黨謀一公益，於願已遂」。⁷⁹ 故事關同鄉，無論大小，林紓都極為熱心。何況，在他看來，愛鄉本是仁人君子最基本的品德，所謂：「余聞愛人之君子，其試手也，必先其鄉」，由家鄉推開去，方可「仁被宇內」；「若泯然不以鄉為恤，而望其心天下，此必不可至之數。」⁸⁰ 因此，對林紓的鄉情也不宜作狹隘的理解，而應視為其愛國心的源頭。

本著愛鄉情切而加意維護海軍，並不意味著林紓對海戰中的過錯一概放過，功罪分明實為其基本態度。儘管對丁汝昌與劉步蟾也有怨詞，稱其「雖非將才，尚不降敵而死，亦自可憫」（卷下，頁 28）；但論及將士奮勇作戰卻終歸失敗的原因，林紓仍憤慨地指認丁、劉要負很大責任：練兵有方的英國軍官琅威理「為劉步蟾所逐」（卷下，頁 23），「已為海軍全毀之張本矣」（卷下，頁 28）；「坐令全師敗衄」（卷下，頁 18）的丁汝昌即便自盡，林紓也認為不足以抵其罪。⁸¹ 其中，劉步蟾亦為福建

⁷⁹ 林紓：〈與陳滄趣（三）〉，李家驥、李茂肅、薛祥生整理：《林紓詩文選》，頁 285。

⁸⁰ 林紓：《畏廬三集·贈李公星治序》，頁 14b。

⁸¹ 林紓所云：「郎威里為劉步蟾所逐」，乃指「撤旗事件」。1886 年琅威理因訓練有功，由醇親王賞給提督銜，便以為已升任「提督丁汝昌的副職」。而 1890 年 3 月 6 日，北洋艦隊在香港時，丁汝昌因事離船，劉步蟾下提督旗，換總兵旗，表示自己為艦隊最高統帥。琅威理與之發生爭執，李鴻章支持了劉，琅即辭職。

船政學堂駕駛班第一屆學生，林紓卻不因其為閩人即一味偏袒，迴避追責，表明在鄉誼之上，更有國族利益在。因此，於同情之外，林紓亦著意為海軍謀求反敗為勝之道：「所願當事諸公，先培育人材，更積資為購船製礮之用，未為晚也。」（序頁3）這些在《不如歸》譯序、夾批以及回末評中表達的見解，無不透顯出林紓自許為警醒同胞的「叫旦之雞」（序頁3）、期望以此「報國」（序頁3）的深心。

回到《不如歸》，可以看到，林紓的解讀對當時的讀者確實發生了影響。署名「藏暉樓主人」的詩人寫過一組〈讀小說絕句〉，關於《不如歸》的一首云：

礮翻黃海浪花飛，苦戰歸來百事違。
國恥癡情兩淒絕，傷心怕讀《不如歸》。⁸²

「國恥」顯然是中國讀者獨有的感受，戰敗的沉痛與情愛中絕的悲戚糅合在一起，才是小說最勾起人傷心的痛點。而這樣的提示正來自林紓。

由此可見，林紓對福建船政局與學堂、對家鄉以及海軍的關愛，實際已是將傳統的鄉土之情與現代國家思想交融，使原本局限於一鄉一地的情感，因此得到提升、光大，投射到體現國家實力的中國海軍身上。愛護鄉人、故鄉以至海軍，正所以愛國也。林紓之所以汲汲為閩人占主體的海軍將士洗冤，進而傾力維護海軍的聲譽，都可於此獲解。

2017年2月21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而琅威理訓練嚴格，故海軍中流傳「不怕丁軍門，就怕琅副將」之說。琅離開後，軍紀鬆懈。林紓因此認為，琅威理的離去導致了海軍的戰敗。參見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276-277。

⁸² 藏暉樓主人：〈讀小說絕句一百首〉，《越報》第1期，1909年11月，頁80。

徵引書目

- 小笠原長生：《海戰日錄》，東京：明治二十八年（1895）初版，二十九年（1896）再版。
- 王蘧常：〈甲午死難將士題名記〉，《申報》第17版，1932年1月8日。
- 田村維則編：《征清戰史》，東京：自刊本，1896年。
-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 吉田精一著，齊幹譯：《現代日本文學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 吉羊：〈甲午中日之戰中之中國一健兒〉，《申報》第11版，1931年10月6日。
- 池仲佑編：《海軍實紀：述戰篇》，北京：海軍部印刷所，1926年。
- 池仲祐編：《西行日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08年初版，收於陳悅主編，吉辰譯注：《龍的航程：北洋海軍航海日記四種》，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3年。
- 朱羲胄述編：《貞文先生年譜》，上海：世界書局，1949年。
- 朱羲胄述編：《春覺齋著述記》，上海：世界書局，1949年。
- 我佛山人：《劫餘灰》第一回，許優民主編：《月月小說》第10號，1907年11月，上海：群學社圖書發行所，頁39-68。
- 吳趸人著，王俊年校點：《恨海》，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 周作人談，梁縉武譯：〈閒話日本文學〉，《國聞周報》第11卷第38期，1934年9月24日，頁1-4。
- 林紓：《畏廬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10年。
- 林紓：《畏廬續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年。
- 林紓：《畏廬三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
- 林紓：《蜀鵲啼傳奇》，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
- 林紓著，李家驥、李茂肅、薛祥生整理：《林紓詩文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
- 林紓著，夏曉虹、包立民編注：《林紓家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 林琴南：〈記甲申馬江基隆之敗〉，《禮拜六》第 159 期，1922 年 4 月 29 日，頁 7-10。
- 林慶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年。
- 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 年。
- 高時良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洋務運動時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年。
- 康有為：〈琴南先生寫《萬木草堂圖》，題詩見贈，賦謝〉，《庸言》第 1 卷第 7 號，1913 年 3 月，「詩錄」，頁 1。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
- 戚其章：《中日甲午戰爭史論叢》，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 年。
- 郭勇：〈「暢銷書」的策略：透視《不如歸》的帝國主義話語〉，收於徐曙主編：《日語教育與日本學》第 2 輯，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93-102。
- 張俠、楊志本、羅澍偉、王蘇波、張利民合編：《清末海軍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年。
- 張俊才：《林紓評傳》，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 商務印書館：〈新年消閒之樂事（哀情小說）不如歸〉，《申報》第 2 張第 8 版，1909 年 1 月 28 日。
- 黃遵憲著，錢仲聯箋注：《人境廬詩草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 楊文瑜：《文本的旅行——日本近代小說〈不如歸〉在中國》，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15 年。
- 楊維忠編著：《東山名彥——蘇州東山歷代人物傳》，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07 年。
- 鄒波：〈林紓轉譯日本近代小說《不如歸》之底本考證〉，《復旦外國語言文學論叢》2009 年秋季號，2010 年 3 月，頁 123-129。

- 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年。
- 葉承慶纂輯：《鄉志類稿》，收於《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誌專輯8》，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 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林萱治主編：《福州馬尾港圖志》，福州：福建省地圖出版社，1984年。
- 潘少瑜：〈國恥癡情兩淒絕：林譯小說《不如歸》的國難論述與情感想像〉，《編譯論叢》第5卷第1期，2012年3月，頁97-120。
- 德富健次郎著，林紓、魏易重譯：《不如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年。
- 德富健次郎、德富愛：《富士》第2卷，東京：福永書店，1926年。
-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
- 錢實甫編著，黃清根整理：《北洋政府職官年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
- 藏暉樓主人：〈讀小說絕句一百首〉，《越報》第1期，1909年11月，頁80。
- 羅邕撰，吉羊撮錄：〈徐希顏家傳〉，收於〈甲午中日之戰中之中國一健兒〉，《申報》第11版，1931年10月6日。
- 蘆花生著，惜月軒譯編：《（漢譯小說）不如歸》，東京：共成舍，1906年。
- Tokutomi, Kenjirō. *Nami-Ko: A Realistic Novel*. Translated by Sakae Shioya and Edwin Francis Edgett. Boston: H. B. Turner & Co., 1904.

